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曲徑集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曲径集/谈敏著.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5642-2049-5/F · 2049

I. ①曲… II. ①谈… III. ①经济思想史-世界-文集 IV. ①F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59750 号

☐ 责任编辑 温 涌

☐ 书籍设计 张克瑶

☐ 责任校对 赵 伟 卓 妍

QU JING JI

曲 径 集

谈 敏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东路 321 号乙 邮编 200434)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 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同济大学印刷厂印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装订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710mm×1000mm 1/16 22.5 印张 345 千字

定价: 66.00 元

引言

古语说，曲径通幽，是指弯曲的小路通到幽深僻静的地方。这既可以理解为领悟禅理妙道的路途之曲折蜿蜒、崎岖不平，需要经过艰苦的跋涉，如同人生的哲理；也可以理解为治学的道路若想攀登学术高峰，不要奢望一马平川的坦途和轻而易举的成功，只有付出艰辛的努力，才有望达到新的意境。我的治学之路之曲折，更是别有一番滋味。34年前，当我投师胡寄窗先生门下读硕士研究生时，胡老已是77岁高龄，仍孜孜不倦于学术研究，并且在新的学术春天里，为了挽回“文革”时期学术遭到践踏的损失，重振沉淀多年的学术功力，焕发积蓄已久的学术生机，继完整出版三卷本《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鸿篇巨制之后，短短数年内，出版中、英文专著七八部，发表一系列学术论文，穿行于古今中外的经济学各个领域，其钻研之深、涉猎之广、论述之精，以耄耋之年而论，令人叹为观止。这是感化的力量和无形的熏陶，浸淫其中，耳濡目染，自会将学术的追求深深扎根于心中。从那时起，我便油然而生一种奋斗的志向。未料阴差阳错，在我精力最旺盛的时期，却走上一条往往游离于学术探索之外的大学治理道路。为此，在20多年忙碌而繁杂的学校管理岗位上，只能见缝插针，利用工作之余，维系自己的学术初旨，从时断时续的研究中去体味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的乐趣。如此点滴累积起来，其成果竟也有可观之处。兹将能够反映本人这一曲折学术经历且已公开发表或出版的有关论文、译文、著译作前言与后记以及部分著述内容，连同个别工作体会文章，串连起来，辑录成册，取名《曲径集》，既有敝帚自珍之意，亦算是对过去治学之路的一个回顾，“通幽”不过闹中取静而已，“曲径”却是实实在在的。

就读硕士研究生的3年里，终日埋首于应付课程和阅读文献，最大的收获，倒不在于掌握了多少知识，而在于作为胡老1980级唯一的学生，养成了

每周两三次到胡老家里聆训受教的习惯。从开始的受拘束到逐渐活跃再到后来的无话不谈,从最初的耳提面命到后来的指点迷津乃至润物无声,时时处处感受到一位博学多才而又饱经沧桑的长者的宽容、睿智、严谨与执着,以及扶掖青年后学的倾心和期盼。其中感触最深者之一,便是踏踏实实做学问,不要急于求成。因此,学习期间,虽有几篇习作,都是用来锻炼学术研究的思路、逻辑与表述,争取献丑的机会以求教于导师,不曾公开发表过。真正算得上独立完成和发表的第一篇学术文章,应当是基于硕士论文修改而成的《论农本工商末思想及其历史演变》。由此又衍生出几篇文章:《欧阳修晚年政治态度之我见》一文,是在写作硕士论文过程中,看到史学名家的不同论点,于是以初生牛犊般的好奇,提出质疑,不仅引来名家的驳论,还看到驳论中回避了有关史料误用的关键性质疑,为此反倒增添了些许自信。《欧阳修的经济思想》和《庄元臣的经济思想》二文,均系搜集硕士论文资料时发掘出来的新内容,于是分别拓展研究,铺陈成篇。《历代封建家训中的经济要素》一文,同样是在考察硕士论文资料时发现的新线索,据此重新下了一番功夫,将历代家训系统梳理一遍,也算是为利用家训史料进行经济思想史研究,作了一个新的尝试。以上文章可能有的发表较晚,却均完成于1986年以前。这也是我硕士毕业留校后跟随胡老一边担任助手,一边从事独立研究的一段磨炼时光。其间自1984年起被任命为经济学系副主任,在为本系教职工服务的同时,仍可享有当一名普通大学教师的率性和惬意。

1986年因考取胡老的博士研究生,遂辞去系副主任一职,打算专心致志于学问。此时正好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向胡老约稿《中国财政思想史》一书,胡老便将撰写初稿的任务交付于我。这是无言的信任,也是莫大的挑战。既然有胡老把关和他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基础,则无须诚惶诚恐而缩手缩脚,不如借此机会,增补新的史料和探索新的领域。经过一年多的资料搜集和写作,最终形成60万字的初稿。待此书1989年出版后,本来打算将书中具有新意、得到胡老认可而又能独立成篇的部分,单列出来再作修订,分别发表以饕读者。结果仅完成《从远古传说看中国财政思想的起源》及《汉武帝时期的工商资产税问题》二文,即因忙于别的事务而无暇他顾,未得继续。此前1988年胡老与我联名分三次连载发表于《北京财贸学院学报》的《〈管子〉的财政思想》一文,属于胡老提携后人之作,尽管由我拟就初稿,

但其内容系依据胡老原著而改写以突出有关财政思想的特点,故本集未予收录。另外收录的是该书最后一章《清末民初的财政思想》,因为这是新的开拓,费了一番心血,摸索着在系统爬梳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先作概括性叙述,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打下一个基础,这也得到胡老的鼓励和肯定。这本书出版25年后,最近原出版社又提出再版此书,可见它仍具有学术生命力。至于后来的《中国财政思想史教程》,乃应教学所需而编,实则是《中国财政思想史》的缩写本,这在收录的教程序言里已有说明,更多的是借此向已经驾鹤西去的胡老表达敬意。

1988年对于我的学术研究来说,是一个转折点,是一个从此背负沉重的管理责任而逐步将时间压缩到逼仄极致的标识,也可以说是曲径的开端。当时我正在准备博士论文,又经学校批准拟赴欧洲作访问学者,对未来的学术道路充满憧憬,突如其来,获知让我担任校长助理!从学校领导的谈话中,我明白这不仅是组织的信任,也征得胡老的同意,体现他老人家一向以坐言起行作为学者本色的安身立命宗旨。自此以后,如何把原来的日程安排颠倒过来,以管理工作为主,以学术研究为辅,甚至牺牲学术研究以服从于管理工作,让我适应了好长一段时间。开始还允许我利用一部分工作时间去完成博士论文,殊不知稍后便遇到那场风波,为了应付各种突发事件,甬说写论文,连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节奏也被打乱了。在头绪繁多以致不分昼夜地紧张工作中,抽空思索和写作论文,竟成为我任职行政岗位后的最初体验。亏得胡老当初将博士论文的设想列为博士考试科目,促使我对博士论文的准备动手早,思路比较成熟,资料比较充分,故身处如此动荡的工作局势,居然能按时完成,实属幸事。《重农学派经济学说的中国渊源》一文,正是博士论文的选摘。此论文后经修改,以《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一名出版,胡老为此专门撰写《经济学说史研究中的重大突破——评〈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视野开阔,勉励有加,故亦附录此集。此书1992年初版后,获得学术界的好评,时隔6年和22年,出版社又分别于1998年和2014年改版作第二次和第三次印刷,同时也为我提供了回顾既往、拓展认识及回应质疑的机会,可见“重印后记”和“三印后记”,这已是后话。当时围绕博士论文的写作,还有一些副产品。主要是翻译魁奈的原作《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此译本亦在相隔22年后重新再版),并在中译本序言的基础上



形成《关于魁奈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文，又应邀为《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翻译“魁奈”条目。此外也曾想从博士论文中选择一些能够单独成篇的题目，以广其效，但在发表《〈经济表〉与〈周易〉》一文后，便放弃了这一想法。这不仅因为杂事不断增多，还因为咀嚼吃过的东西，食之无味。以后随着研究选题的拓展，愈益感觉探求新东西的兴奋，被新的探求欲望推着往前走，在有限的时间内，也就更不愿炒冷饭了。

1991年转任副校长，按照那时的惯例，仍可以从事独立的学术研究。起初，伴随学术兴趣的转移，曾有庞大的研究计划，试图着手进行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的整理和总结。结果经过调整，兵分两路：

一路组织力量，重点研究新中国的经济思想，从1949年起，截止于1989年。其间几经波折，先请胡老领衔，亲率子弟兵攻关，不承想胡老的去世，打乱了原来的部署；随即我又赴美半年，无人鼎力相助，遂失一鼓作气之机；待我返国再拾残局时，已属物是人非，不得不另起炉灶。重新组织力量的过程，多少借助了副校长分管科研的有利条件，选择并动员校内相关经济管理专业的才干能人参与，最终形成《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1949—1989）》一书及若干本专题著作，与之相关的组织过程及总体设计思想，分别见于《纲要》一书的序言和绪论。但凡事有利则有弊，我通过实际主持这一研究项目，深切体会到，若要集体完成一项高水平的学术成果，非得参与者志同道合并具备实现同一目标的活跃学术氛围与相应学术能力不可，这都不是单凭行政手段或物质刺激所能获得的。因此，后来对于主编学术项目之事，除非具备成熟条件或亲力亲为参与，一概不再组织或接受。这也算是曲径中之曲径，既避免行政职权介入或干预正常的学术研究，更要防止滥用行政权力从所谓的学术研究中谋得自身利益。

另一路由自己承担，重点研究1919～1949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为此着手历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并找一些人帮忙比较系统地作相关书目的索引，其部分经历和成果可见《中国经济学图书目录（1900—1949年）》的前言。随后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过半年的访求和查阅资料，又把研究目标调整到先厘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1919年“五四”运动及以前的传播状况。当时踌躇满志，想在不长时间内完成这一目标，以便转入对此后30年传播的重点考察。可是实际进展却不然。一方面在两路研究的并进

过程中,就我本人而言,相互之间有所借鉴和贯通,前一路《纲要》的绪论中用一定篇幅述及中国经济思想的先行思想资料及其主要来源,既吸收了后一路研究的初步成果,同时也暴露出粗浅研究的漏洞,如采信《泰西民法志》一书成于1898年(实为1912年)一说,即缺乏审慎考证的失误;以此类教训为例,于是下决心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早期传播于中国的有关历史资料,做较为彻底的清理。另一方面多头应付,不免分散精力,尤其是任职的变化,大幅度压缩自由支配的时间,使学术研究真正变成一种奢侈。这两方面的原因合起来,遂于不知不觉中,让后一路的研究走上了一条漫漫长路。

从1998年起,受命担任学校党委书记,一年后又兼任校长,接着各种社会兼职也接踵而至。重担在肩,如履薄冰,必须心无旁骛,致全力于学校事业,因此终日忙忙碌碌,根本无暇于个人学术爱好。直至逐渐适应工作后,才有可能挤出一点空闲,重拾旧业,断断续续推进自己的研究。久而久之,在这种治学与治校相互依存的曲径中,慢慢养成一些独特的自我约束或工作习惯:以追求高水平的个人学术研究去激励追求高水平高质量的办学目标,不愿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亦不信命中注定的先天安排或作茧自缚的人为设碍,褒之者称为大胆改革、勇于创新,贬之者称为破坏均衡、有损和谐;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应酬或作秀式的出头露面,尤其不喜好花时间去拉小圈子的关系,或假公济私去捞外快,或为私利去讨好有权势者,宁可保留珍贵的时间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包括学术研究,褒之者称为保持学者的尊严,贬之者则称为清高或不讲情面;按照学术的逻辑,少说正确的空话或无意义的废话,多做务实的探索和有效的服务,褒之者称为敢于担当,行事果断,贬之者则称为过于认真,不够通融;其实,更多的时候,一直处于繁忙的工作状态,间歇式逗留一下,沉浸在学术研究之中,可以起到平复情绪、缓解压力、调节心态的效果,用时髦的话说,这是心灵的港湾。无论如何,这个时期的学术成果积累极其缓慢,除了偶尔发表学术文章,如《中国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一文,其他形诸文字的许多内容,大量都是公文,虽有一些貌似学术的著述公开发表和出版,实际上也都是应时之作或命题之文,均无必要收入本集。

兼任两项职务数年后,我主动向上级组织提出不再担任党委书记而专任校长的要求,经批准在2004年卸任党委书记一职。这时虽有心力交瘁之



感,但并不是想借此减轻负担,也不是想趁机多做些自己的研究,而是考虑到现有的监督体制需要这样的制衡安排。至于说放着似乎更加权高位重的党委书记不做而选择校长一职,姑且不论自己心里从未把大学的领导职务当作什么官位,当时还有另一层考虑:自以为学校在新时期的大政方针已经确定,相关的物质条件有所改善或已具备改善的基础,适合自身发展的改革路径也初见端倪,关键在于真正落实到有效提升学校整体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的核心目标上,而这恰恰需要熟悉情况的校长站在第一线,负责具体的实施、协调、担当和推进。为此,职务减轻了,责任和压力并未减轻,反倒需要应对更多陌生、多样、细致、琐碎、棘手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因而仍然谈不上有稍显宽裕的个人研究条件。只能将有限的业余空闲,点点滴滴,加以利用,倾注于既有学术课题的研究和积累。倘若学校改革继续深入,或许还要花费更多时间、付出更多精力去迎接新的挑战,无奈事与愿违,各种有形或无形的掣肘随之而生,制约或延缓改革的进程乃至戛然而止。这是另一个话题。既然无法推进新的工作,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当紧凑的开拓进取转变为松弛的维持现状和等待时机后,可资利用的空闲时间也就多了起来。于是加紧业余研究,并将日积月累而形成的大量初步研究成果,分解为两个部分,先重点整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中国以前的部分内容,最终定稿为150万字的《回溯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下简称《前史》)并得以出版,其中的学术探索与心路历程,均可见《前史》之“跋”。此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2012年,在党政管理岗位上摸爬滚打24年后,终于卸任校长一职。随着职务的解除,责任骤减,压力释放,心境解脱,也意味着学术曲径的结束而重归正途。然而时值63岁,富于创造力的学术年华已经过去,要实现自己的学术宿愿,时不我待,只有全力以赴,抓住最后的暮年时光。基于此念,自卸任之日起,即不再参与学校的任何管理事务,这既是履行对后任领导班子的工作不施干预的诺言,也是谋得自身的解放,回到经济学院做一名普通教授,不受干扰,为自己的研究创造一个平平淡淡、安安静静的适宜学术环境。皇天不负有心人,卸任后不到两年,后一部分的研究进度明显加快,现已形成300余万字的《1917—1919: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启蒙》书稿,付梓后正待有关部门鉴定,以期正式出版,其“后记”亦收入本集。至此,22

年前所定选题的序曲部分研究,总算告一段落。今后进入正题的研究,将会改变研究的方式,但不会改变研究的主题,这又注定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恐怕终我一生,亦未必能够完成。不过当这种研究经年累月,已经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时,便也不觉得累,而是乐在其中。

在本集中,还收入了怀念胡寄窗先生和赵靖先生的两篇文章。胡老是我的恩师,怀念胡老,寄托了我永远铭记在心的深切情感,自不待言。赵先生同样是我踏入本学科起就一直景仰和敬重的学术前辈,怀念赵先生,代表了我学术前行的道路上,对一批德高望重的学术前辈的悉心提携与楷模风范的感恩和致谢。此外,回顾 20 多年管理工作与学术研究交融在一起的曲径过程,从管理工作角度看,为了有个交代,本集还从已发表的工作类著述中,选择三篇文章作为代表。一篇是任副校长期间编译的《国外 MBA 教育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一篇是任校长期间思考的《厚德博学,经济匡时》,再一篇是卸任后所写的《中国教育改革:理念、策略与实践》序,从中可以体味大学的治理,是需要一点学术的精神和情趣的。

本集所载,不是本人学术成果的全部,或者说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它犹如一根线索,将本人学术生涯的各个片断,串连起来;又像是一本相册,将本人在起行做事的同时不愿放弃坐言治学的独特景象呈现出来。值此 65 周岁之际,回首往事,不止是一段曲径,还浸透着浓郁的学术气蕴与情思,久久不能散去。姑念于此,是为引言。

2014 年 7 月 2 日于武川书屋

目 录

引言	001
论农本工商末思想及其历史演变	001
欧阳修晚年政治态度之我见	014
欧阳修的经济思想	018
庄元臣的经济思想	027
历代封建家训中的经济要素	033
从远古传说看中国财政思想的起源	054
汉武帝时期的工商资产税问题	061
清末民初的财政思想	069
《中国财政思想史教程》前言	134
重农学派经济学说的中国渊源	136
[附]经济学说史研究中的重大突破	
——评《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	153
魁奈(Quesnay, François)	156
关于魁奈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	176
《经济表》与《周易》	192
《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重印后记	207
《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三印后记	228



《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1949—1989)》序言	234
《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1949—1989)》绪论	237
《中国经济学图书目录(1900—1949 年)》前言	266
中国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	
——从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学”主张所想到的	269
《回溯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跋	285
《1917—1919: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启蒙》后记	291
怀念我的恩师——胡寄窗先生	310
怀念赵靖先生	321
国外 MBA 教育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来自哈佛商学院的调查报告	325
厚德博学 经济匡时	
——在上海财经大学建校 90 周年校庆大会上的校长讲话	340
《中国教育改革:理念、策略与实践》序	345

论农本工商末思想及其历史演变

“农本工商末”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同时也是本世纪以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内流传甚久、影响极大的支配思想之一。两千余年来,凡是谈论农、工、商等问题,特别是制定有关政策的人们,大多与此思想有不同程度的关联。既然如此,农本工商末思想自然会成为近代学者考察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将“本”、“末”与农、工、商问题结合使用,是战国时期才出现的特殊语言形式^①。它反映出这一时期由于封建地主经济的巨大发展,改变了社会各阶级的实力状态,因而要求将重农抑工商的问题提上政治日程。“重农”是自古以来的传统思想,以“本”或“本务”来代指农业,不外乎强调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根本意义;而“抑工商”思想的产生,则是战国以来对待工商态度的重要转折。最初一般用“末”或“末作”来表示工艺技巧,到战国末年,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韩非进一步将“末”的外延从“技巧”扩大到“工商游食之民”(《韩非子·五蠹》),形成了“农本工商末”的完整概念。从此,用“重本抑末”来表示重农抑工商观点,便成为人们约定俗成的习惯用语和历代封建王朝对待工商业的基本态度。

^① 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春秋末年,范蠡曾主张“农末俱利”。此以“末”字表示“商”,实系司马迁时代的习惯用语,非范蠡当时的原文。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巩固新生的地主阶级政权,将“上农除末”(《史记·秦始皇本纪》)定为国策,这意味着重农抑工商已被确定为大一统中国的经济指导观点。特别是在西汉初年,一些著名的重农思想家如贾谊、晁错等人,他们面对当时商人活动猖獗的现实,把大小“商贾”统统作为抨击的对象,呼吁“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提出“使民以粟为赏罚”的“贵粟”主张(《汉书·食货志上》)。这不啻是排斥了工商业尤其是商业的正常功能,将先秦以来的重农思想推到它的极端。

但是,两汉的统一毕竟为工商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活动领域,并出现了像司马迁这样农工商并重的伟大史学家、思想家。如他认为,农、工、商三者均系“富国”、“富家”的源泉;贤人高士与农工商贾一样,具有追求“富厚”的本性;对当时“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的兴旺景象,备加赞赏;提倡平民百姓从事工商“末业”,以为“贫者之资”等等(《史记·货殖列传》)。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他还开创了专门为精于发财之术的大工商业者立传的史书先例。凡此种种,与汉初甚嚣尘上的抑工商主张迥然不同。由此也表明那时的重本抑末观点,尚未取得社会支配思想的地位。

重视工商与抑工商思想的同时存在,终于在西汉中期酿成盐铁会议(公元前81年)上的正面交锋。以桑弘羊为代表的一方主张治理国家应“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盐铁论·本议》),鼓吹“农商交易以利本末”(《盐铁论·通有》);甚至否定单靠农业以“富国足民”的传统思想,认为“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盐铁论·力耕》),公开宣扬经商活动才是致富的真正原因。

桑弘羊的重商观点,遭到了儒家反对派贤良文学们的猛烈攻击。他们坚持认为,唯有“本农”才能“富邦”、“富民”。相反,“末盛则本亏”(《盐铁论·本议》),从事工商活动的结果,势必造成“均贫而寡富”(《盐铁论·力耕》),兼之工商业者生性贪婪欺诈,故必须“崇本退末”。这些由各地选拔而来的儒者所发表的意见,虽大多因袭前人的陈说,但维护“重本抑末”权威地位的观点适应了当时封建中央政权要求思想“定于一尊”的统治形势。特别是随着桑弘羊在政治斗争上的失败,贤良文学的主张更被看作确定不移之论,成为后代重农抑工商论者反复咀嚼的理论根据。

盐铁会议上的斗争,标志着农本工商末思想发展的重要转折。此后,类似司马迁和桑弘羊的那种农工商并重或特别重视商业的观点逐渐消沉,而重本抑末思想则大为流行。由此也表明,以重农抑工商为其基本内涵的本末思想之形成,虽不必独由儒家学派所创始,而是战国时期各学派的共同主张,尤为法家代表人物所倡导,但进入西汉中期以后,由于儒术取得独尊地位,农本工商末观点也就被视为儒家经典教谕之一,从而构成以后两千年儒家传统文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到东汉时期,虽然还有王充以经商为喻来说明圣贤的“先知”(《论衡·知实篇》),甚至提出“百工皆贤人”(《论衡·定贤篇》)的大胆论断,但这些工商观点连同其名著《论衡》,一概被封建统治者斥为“异端邪说”而长期受到埋没。至于稍后王符提出农工商三者各有本末的新概念^①,实际上巧妙地改变了以本为农、以末为工商的习惯搭配,打着“崇本抑末”的招牌而亵渎它的神灵。惟其须通过这种迂回曲折的方式来表达农工商并重的观点,恰恰反映出重本抑末思想发展到此时,已经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取得了巩固的支配地位。

二

西晋初年,社会经济遭到几十年战乱破坏而稍事恢复。此时,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封建自然经济给本阶级带来的权益,防止商品货币关系对地主经济的侵蚀,他们除了承袭前代的重本抑末政策外,“贱末”思想迅速膨胀。傅玄便是这一思想的理论阐释者。在他看来,尽管商贾“其业不可废”,但“其人可甚贱”。理由是,商贾破坏了往古的“化淳”风气;在市场上极尽欺诈掠夺之能事;借满足封建统治者的奢侈欲望以牟取暴利;利用官府征收赋税的机会对人民进行盘剥;握有“专市”、“专利”的贸易垄断权以致“四方之资困”;损害农业生产而造成农副产品枯竭;等等。基于以上分析,傅玄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贵本而贱末”的口号(本节引文均见《傅子·检商贾篇》)。从

^① 参见王符著《潜夫论·务本》:“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

“抑末”到“贱末”，虽为一字之转，却反映了一个重要变化，即封建统治者在继续利用政治力量来推行抑工商政策的同时，更重视通过意识形态的思想灌输以造成社会上普遍轻贱工商业及工商业者的风气。这是“本末”思想发展史上一个不应忽视的重要历史阶段，它对于后代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各种轻商诏令和言论鼓噪而起。“贵农贱商”被看作“富国”的大政方针之一（《全晋文·袁准》）。政府公开颁布纯属侮辱性的法令，规定商人必须把姓名写在头上，“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太平御览》卷八百二十八）。至于鄙夷商人为“商贩丑竖，市肆小人”（《晋书·符坚载记》）、饬令“工商皂隶”不染清流（《魏书·孝文帝上》）之类，更是司空见惯。由于贵本贱末思想的强化和广泛传播，轻商观念日益渗透到人们的思想意识中，成为封建士大夫用以进行家庭教育的重要准则。北齐著名的《颜氏家训》鼓吹封建家庭自给自足的好处，告诫人们不可“轻农贵末业”，便是其中的典型。在轻商气氛的笼罩下，当时连贾思勰这样重视地主兼营商业之事的思想家，也不得不在他的《齐民要术》“自序”中特加申明：“商贾之事，阙而不录”，以避经商之嫌。可见，“贵本贱末”观念至此已为人们普遍接受，这就使封建统治者不必单纯依赖抑商的行政手段，而可以同时诉诸人们的轻商意识来更有效、更持久地达到抑制商业正常发展的目的。

三

“重本抑末”或“贵本贱末”思想发展到唐代，除了被尊崇为法律而加以神圣化外，不再具有任何新的内容。士人儒者动辄以此去褒贬人物、判断是非，千篇一律地用来对付一切新出现的工商问题。这种机械地重复以往陈说的思想停滞状况，表明封建本末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已成为不言而喻的传统教条。

然而，辩证法的观点告诉我们，抑末或贱末思想既已发展到教条化的顶点，必然会孕育乃至出现反对的观点；唐代工商业空前繁荣的客观现实，又为这一思想转变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条件。唐代前期已有一些新的工商观点开始露头。如崔融提出工商业者从业已久，“不欲扰其末”；增税关市会使富商大贾受到惊扰；“万商废业则人不聊生”；关市之心不可动摇（崔融：《谏税

关市疏》，引自《唐文粹》卷二十七）等一系列不合时宜的意见，这实际上是替受压抑的商业活动进行呼吁。稍后，又有刘秩主张以“利末而不伤贾”的精神来处理货币问题。此类工商观点在当时抑商、轻商思想弥漫的形势下，透露出一种与传统本末教条不相协调的新的变化迹象。

唐代中期以后，这种变化迹象由微而著。最引人注目的是杰出理财家刘晏，他利用商业经营原则和商人的作用来推行各项财政改革措施，尤其是改变一向由官运官销的传统盐专卖政策，转而依靠私商自行运销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这些经济措施的指导思想显然突破了重本抑末教条的局限，表现出改革者对于商品经济发展的敏锐观察力。刘晏而后，韩愈又对刘氏盐法改革的指导原则，进一步从理论上加以阐释，明确指出“官自卖盐”利少弊多、盐商自行销售可使买卖双方“两得便利”。至于富商大贾会“坐受厚利”，他对此并不介意，而是坚决反对官府“夺其业”（韩愈：《论变盐法事宜状》）。韩愈以一个正统的儒家道统继承人，竟公开为富商大贾辩护，这种态度为秦汉以来所罕有。它标志着儒家工商观点的重要转变，同时对后继者摆脱传统本末思想的束缚，无疑也会产生不小的影响。

唐代出现的变官府专卖为私商自由经营的若干思想因素，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到北宋时期日臻成熟，并且促使封建政权的经济政策发生新变化。北宋年间盐、茶、矾等日用品相继由官府禁榷改为实行“通商”政策，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这种重视商人经营的观点，还经常反映在当时思想家的论述中。如欧阳修从商贾通行有利上下的认识出发，反复论证当权者应“与商贾共利”，以收“取少致多”之效，此所谓“诱商通货为上，制商痛裁为下”（欧阳修：《通进司上书》）。这一政策原则的提出，突破了传统抑商思想的窠臼，反映出一种新的时代精神。与欧阳修同时的有名学者李觏，亦反对官府专卖而主张“一切通商”、“听其自为”。他认为，实行私商自由经营具有保证货物质量、增加商税收入、加速货币流通、减少刑罚事件等优点，因此，大贾富商利用“通商”机会而“射时趋利”，此“非逐末之路”（《李觏集》卷十六，《富国策上》）。这些见解无异于鼓励富裕工商业者自由从事经商活动，与传统的重本抑末教条大相径庭。在这种新形势下，即便是高唱摧抑商人兼并的王安石，也十分注重运用商业经营原则来推行均输、市场等项经济改革措施。甚至连一些反对变法的保守思想家，都不能不受到商品经济发